

09

统战工作史料

选 辑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2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第二辑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二)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二月

封面装帧 范一辛

统战工作史料选辑

第二辑

(上海文史资料专辑之二)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统战工作史料征集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625 插页 2 字数 144,000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7,000

书号 11074·565 定价(六) 0.70元

内部发行



周恩来致黄炎培(任之)信件手迹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九日)



周恩来致张雪澄信件手迹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和杨杏佛
(一九三一年摄于南京)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
委员就职典礼后合影
(一九二七年三月)



前排左起：何洛、王景云、罗亦农、王晓籁、杨杏佛、汪寿华
后排左起：林钧、侯绍裘



聯合日報社外景

聯合晚報重要啟事
(刊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
香港《華商報》)

上海聯合晚報重要啟事

本報創刊於抗戰勝利後，純屬民營新聞事業，在遷出期間，讀者人與聚議的話，感佩人民愛知進的事實，故得廣大讀者之愛護。惜於三十六年五月廿五日，曾遭停刊處分，同人等雖屢經請刊，終未獲果；不料近有生油冰者，擅在東京，發行所謂「聯合晚報」，魚目混珠，厥不倫一，笑，惟以各方未明真相，函達詢問，雖經查證，南京所發行老，與本報毫無關係。

聯合日報社代表人 劉尊棋 王紀華 同啟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申请全行业合营获准，工商界代表向市人委报喜



同业公会代表向市工商联送合营申请书

目 录

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明	卢于道(1)
毛主席关怀知识分子	谈家桢(8)
统战政策是个宝	刘良模(17)
周恩来同志支持《国讯》	张雪澄(26)
回忆重庆二三事	郑 英(36)
陈毅同志为上海统战工作打开局面	陆诒 黄松岗(46)
上海解放初期的统一战线工作	吴月丽(55)
怀念沙文汉同志	金学成(63)
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开展的一些统战工作	孙诗圃(66)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若干史实	杨小佛(73)
职业界救亡运动的片段回忆	李文杰(80)
《联合晚报》的战斗历程	王纪华(90)
上海华联同乐会的统战工作	杨延修(113)
上海妇女界难民救济会	朱立波(126)
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	凌集熙(132)
救济失学义卖市场	《救济失学义卖市场》史料编写组(140)
解放前我和共产党接触的几件事	陈铭珊(149)
我和共产党员交朋友的回忆	虞贤法(153)

大合营高潮记实	祝公健(158)
工商界家属在党的统战政策下前进	曹舜琴(166)
团结工商界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	费福泉、陈一心等(171)
党的统战政策推动我参加社会工作	金曰英(183)
党把我们家属组织起来	张家惠(185)
原工商业者及家属谈社会主义改造	(190)
雪中送炭 绝处逢生	韩志明(190)
实事求是 说话算数	郭秀珍(192)
心悦诚服 接受改造	戴伦庠(195)
百年老店获新生	孙照明(196)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季慕卿(200)
放弃特殊收入 争取自食其力	许兆谷(204)

共产党指引我走向光明

卢 于 道

六十年前,我还是个青年。当时凡是稍有志气的青年,谁都想学些实际学问来把国家建设得富强起来。我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于一九二六年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于一九三〇年获得博士学位回国。

回国之初,满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可是事与愿违,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弄得民不聊生,灾难深重。我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上海很快沦陷,我到了重庆,在复旦大学任教,并代理中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职务,后又代理中国科学社总干事。当时重庆的政治气压很低,人们称之为“雾重庆”,国民党所执行的仍然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九四四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我和复

旦同事张志让、潘震亚以及吴泽等，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座谈会大体上每月举行一次，约有二十多人出席。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逐步演进为学术界的政治团体，名为“民主科学社”。

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邀请重庆学术界人士举行九三座谈会，出席的有潘菽、何鲁、刘及辰等二十余人，我也参加了会议。首先讨论新疆问题，其次交换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一致认为政治协商会议必须完全公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褚辅成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发表声明，警告大家要小心提防某种分子假借民意，破坏民主宪政运动。何鲁沉痛指出，今日的中国，赵高太多，若不予以铲除，将蹈亡秦的覆辙，并郑重忠告马歇尔和国民党当局，如果要真正把中国搞好，必须亲自采访中国在野专家学者的公正意见。会议决定推选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筹组九三学社，声援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代表，完成他们的历史任务。

一九四六年五四纪念日的下午，举行九三学社成立大会，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为主席团，由褚辅成致开幕词，许德珩报告筹备经过，税西恒报告社费收支情况。我和王卓然、张雪岩等在会上发言，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在政府根据政协决议改组以前，美国不应有援助中国任何党派之行为，希望马歇尔以公正态度继续调处国共纠纷，实现全中国的和平民主。会议通过社章、缘起、成立宣言和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以及致美国国会电文。最后选举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张西曼、涂长望、竺移今等为理事，我和侯外庐、黎锦熙、梁希等为监事。

一九四三年前后，英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会员李约瑟来到重庆，

为他的著作《中国科学史》搜集材料，兼有扩大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影响的意图。他当时的活动中心在沙坪坝中央大学，在他的影响下，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这个协会的宗旨，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科学成就为残酷的战争服务，要求科学界起来监督，使科学成就用之于人类福利，此外，还进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当时我经常到沙坪坝去看潘菽和涂长望同志，和他们交换对时局的意见，认为这个协会有一定的进步性，我就毅然参加了。

使我永远难忘的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曾家岩新华社接见我的情景。大概在一九四四年，我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同志约我在新华社会见的通知。当时重庆的白色恐怖很严重，新华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同志就因为去新华社而遭遇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我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新华社。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第一句话就说：“你的妹妹们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芝英在鲁艺学习。”接着他和我谈了政治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当时延安正在搞生产运动，他谈了许多关于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在我的印象中他当时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要搞生产离不开科学技术。延安这个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回忆我妹妹们去延安时，我自己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是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一九四六年夏，我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中共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同志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领导白区斗争。九三学社在上海密切联系一批进步与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

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美扶日运动等。当时,九三学社中央已迁北京,上海方面的工作由褚辅成领导,负责具体社务的主要是笄移今、顾执中、洪铭声等同志。许德珩主席对上海九三的工作非常关心,对一些重要活动,都有亲笔指示。

我回上海后,除参加九三分社的活动外,还参加“高教联”的活动。一九四六年夏,遇到了妹妹卢琼英,介绍我认识李正文同志(解放初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我参加了“高教联”,一同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同志。我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当时的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李正文同志经常参加“高教联”的会议,并向我们作形势报告,我们从他的报告中了解到解放战争的形势,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感到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当时各高等院校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发展不平衡。进步势力较大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和同济大学,交大更占优势,上海法学院的进步势力也不小。随着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恶性发展,反对蒋政权的群众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垂死挣扎,残酷镇压人民,逮捕大批进步学生。一九四八年为了营救被捕进步学生,我和上海法学院领导人沈钧儒等同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与市长吴国桢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在群众压力下,吴国桢不得不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

由重庆回沪后,我继续参加科学界的活动。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为了保障科学工作者的权益,在《观察》第四卷第十四期发表声援北平四大学九十教授书及《观察》社发表的《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一文,驳斥并质询国

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歪曲事实，妄图迫害进步教授和学生的反动讲演，抗议当局蔑视人权的暴行。当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实际上处于半地下状态，许多活动是同宋名适同志所主持的上海技术协会和中国科学社联合进行的。当时我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负责技术协会这方面工作的还有胡永畅、高孝冲、闵淑芬等同志。钱三强同志由法国回来后，我们特请他来中国科学社作报告，他看到我们这么热心科学工作而感到惊奇。其实当时上海科技界的活动，已由单纯的学术性活动发展为反法西斯和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性斗争，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的结果。

在这期间，复旦中共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我的帮助很大，我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经常躲在我家过宿避难。胡宣明同志在复旦土木系读了四年，即将毕业，他为了斗争的需要，要我介绍到科学社当一名小职员，工资仅够吃饭。我在一楼办公，他在三楼办公，经常看到下午五、六点钟，有不少青年男女来社和他一起唱歌跳舞。解放后知道，中国科学社是胡宣明同志地下活动的一个据点，后来这些青年男女陆续到浙西四明山打游击去了。

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国民党在淮海战役节节溃败后，企图凭长江天险负隅顽抗，同时在上海大肆镇压革命群众和知识分子。正在这时，李正文同志突然到我家，问我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我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他又问我，愿走苏北，抑经香港北上？我答以愿经香港北上。约两个月后，他送来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胡宣明同志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他看着我安全上船后，才迟迟离开。

到香港后，首先遇到夏衍同志和周科征同志。夏衍同志过去我不认识，周科征是我爱人的妹夫，他们告诉我，郭老(沫若)和沈老(钧儒)已赴东北大连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要我在九龙暂住，等待北上机会。正在这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在香港报上发表，我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我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党租用的葡萄牙货轮北上烟台。到了烟台，受到解放军指战员的热情接待，而后我们乘车赴济南，再西行到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一下车就遇到卢琼英和陈翰伯同志。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陈翰伯同志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他是多年的老党员，在上海时是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最使我感动的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在我们一下车后就接见我们，亲切地对我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我们讲解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两、三天，他又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我们！”我们听到这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大家想，解放战争的胜利虽成定局，但大军尚未渡江，国民党反动派妄想凭长江天险搞两个中国，毛主席在这样繁忙的时刻还这样关心我们，多么令人感动！

一天下午，我们来到了毛主席的住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我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我们上车，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数日，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我们由石家庄到了北平。三、四月间，我参加了由郭沫若同志率领的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的中国代表团，该团秘书长是丁瓚同志，也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的会员。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所主持的世界和平大会原定在巴黎召开,后因法国拒绝中苏两国代表团入境,改在捷克的布拉格和法国的巴黎分别举行。这说明科学运动也超越不了政治斗争。

回国不久,我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亲耳听到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

回顾我所走过的历程,深深感谢共产党指引我从黑暗走向光明,同时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历来是重视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科学技术和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真正为人类造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伟大的祖国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钻研本行科学,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高景仰整理)

毛主席关怀知识分子

谈 家 桢

一

我是一个多年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的工作人员，遗传学是研究生物遗传变异规律的一门科学，是研究生物体遗传信息传递及其表达规律的一门科学。研究和了解基因的本质，始终是贯串在遗传学研究中的一条主线。可是对我国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科研的广大同志来说，今天能够宣传、认识和接受这一观点是来之不易的，是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的。

回顾建国初期，我国全面学习苏联，片面宣传苏联的科学成就，几乎所有的成果都是苏联创造发明的，尤其在遗传学这个领域里，危害特深。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为了解决农业上的困境，归罪于理论指导上有问题，李森科公然反对正统遗传学，对当时许多优秀的遗传学家加以迫害，批判遗传学是伪科学。在那一段时间内，我国也出现极左的倾向，照搬苏联的一套，宣扬米丘林遗传学，对正统的遗传学贴上反动的标签，甚至迫使个别遗传学研究者离开中国。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是放弃我的专业研究，只搞教育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是小事，一切要从大局出发，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国，中国人民从苦难的深渊中站起来了，我由衷地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在党的领导下我表示可以放弃